

革命與治理： 當代中國階級理論的 爭論與反思

• 任希鵬

摘要：二十一世紀初，在「回到馬克思」與「重返階級分析」的呼聲中，階級分析的學理價值被中國學界重新發現，作為社會科學的階級理論得以復興。然而，這一「回歸」卻以拒斥階級鬥爭為前提，無視階級理論作為反思性建構的社會歷史哲學的一面。本文認為，這一現象植根於文化大革命後圍繞階級問題展開的爭論，這些爭論形成了1980年代階級理論中革命與治理的兩個面向；而隨着90年代市場經濟的發展，階級鬥爭轉向社會治理，階級理論的革命面向被「懸置」。在治理範式下，階級分析的回歸通過對階級理論的去革命化、去政治化，實現了階級理論的社會科學化。但80年代的爭論並未終結，革命面向仍然構成了政黨意識形態的一部分，並在新時代「不忘初心」的「偉大鬥爭」和「自我革命」中再次激活，因而當下仍有必要重新思考階級理論及其實踐的社會歷史哲學維度。

關鍵詞：階級分析 階級鬥爭 階級理論 社會治理 去革命化

自1990年代末到二十一世紀初，中國社會不平等問題的日益尖銳使得學界開始反思改革開放初期興起的階層分析的局限性，出現了「回到馬克思」與「重返階級分析」的呼聲，尤其是隨着中國成為「世界工廠」，新工人問題成為學術研究的熱點^①。從階層分析回歸階級分析也就成為改革開放後中國社會結構研究的第二次範式轉換，這一轉換通過對階層分析和階級分析的方法論的反思，使階級分析的學理價值被重新發現，階級分析與階級鬥爭相分離，擺脫了「左」的意識形態教條，被認為是一種更具解釋力的分析範式，階級理論進而成為一種社會科學理論^②。

* 本文初稿曾在2022年第十一屆「法權秩序與中國道路」研討會上報告。感謝強世功、邵六益、劉忠等師友提供的寶貴意見，特別感謝匿名評審人提出的修改意見，一切文責自負。

然而，每當有學者提出「階級鬥爭」的當代價值問題時，就會在思想界引起大量爭論。批評者將階級鬥爭視為法治的對立面，拒絕階級鬥爭、拒絕專政理論，而支持者則將階級鬥爭視為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必然要求^③。表面上看，階級分析與階級鬥爭共享了同樣的概念與分析範式，本應同屬於馬克思主義階級理論，但重新復興的階級分析正是通過與階級鬥爭的分離，實現自身的社會科學化，二者似乎導向不同的價值取向。為甚麼二者共享同樣的概念與方法卻又走向分離？它們的真正分歧究竟是甚麼？為甚麼作為社會科學的階級理論被廣泛接受，但作為社會歷史哲學的階級理論卻引起激烈批評？在新時代「不忘初心」的「偉大鬥爭」進程中^④，面對中國社會經濟分化、階級關係格局的重大轉變，階級理論是否仍有現實意義？我們應當如何思考階級鬥爭問題？

要理解當代中國有關階級問題的爭論，並在當下展開階級理論的思考，有必要回到文化大革命後開始的經濟理論大討論和階級理論的反思之中。在這場爭論中，「告別革命」與迎接法制成為新的共識，通過對文革的反思，開始將階級劃分、階級分析與階級鬥爭區分開來，階級理論中出現了兩個不同面向，形成了「階級鬥爭的長期存在」和「以生產力為中心」之間的緊張關係，這一張力進而延伸為1980年代關於革命與治理的此消彼長的主題，而正是在由革命轉向治理的歷史過程中，階級鬥爭被「懸置」，並為對社會治理問題的關注所取代，法制則成為社會治理的工具。在這一背景下，階級分析的回歸意味着階級理論完全成為一種基於社會治理的純粹經驗性的社會科學研究，作為社會歷史哲學的階級理論則被逐漸淡化^⑤。回溯這些爭論不僅有助於我們理解馬克思主義階級理論在中國的實踐和變遷，也為我們在當下重新思考階級鬥爭問題提供了重要啟示。這一反思並非重新回到文革，而是試圖激活198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序言和《中國共產黨章程》總綱中有關階級鬥爭的「懸置」條款——「剝削階級作為階級已經消滅，但是階級鬥爭還將在一定範圍內長期存在」^⑥，激活有關階級矛盾與階級鬥爭的思考，進而恢復階級理論的社會歷史哲學維度。

一 毛澤東的階級理論及其發展

（一）中國革命與「能動」的階級概念

「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⑦毛澤東的階級分析從來離不開「敵我劃分」的政治判斷，其關鍵在於把握中國社會的關係形態、主要矛盾，進而指導中國革命，如毛澤東所言，「認清中國社會的性質，就是說，認清中國的國情，乃是認清一切革命問題的基本的根據」^⑧。然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近代中國，不僅缺少經典馬克思主義所強調的革命無產階級^⑨，束縛於土地和封建關係之中的農民更難以擁有所謂的階級意識。但毛澤東以「中國社會各階級的經濟地位及其對於革命的態